



清代皇家园林史料汇编（第1辑）

三山五园研究译丛

阚红柳 主编



北京市海淀区文化发展促进中心
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 合作项目



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CAPITAL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海外三山五园研究译丛

编委会

崔述强	于 军	关成启	彭兴业	张宝章
于佩丽	牛爱忠	叶亮清	刘耀忠	李 博
张东旭	陈名杰	杨念群	赵世伟	徐永全
钱进朝	夏明方	黄兴涛	董建中	阚红柳



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CAPITAL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海外三山五园研究译丛 / 阚红柳主编. —北京 :
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5. 6

(清代皇家园林史料汇编. 第 1 辑)

ISBN 978-7-5656-2434-6

I. ①海… II. ①阚… III. ①古典园林—北京市—文集
IV. ①K928.73-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145149 号

阚红柳◎主编

责任编辑	赵自然
发 行	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发行
地 址	北京西三环北路 105 号
邮 编	100048
电 话	68418523 (总编室) 68982468 (发行部)
网 址	www.cnupn.com.cn
印 刷	湘潭市风帆印务有限公司
发 行	全国新华书店
版 次	2015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印 张	28
字 数	600 千
定 价	68.00 元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退换

序

三山五园，是清代皇家园林中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所谓“三山”，原本指的是万寿山、玉泉山和香山；而五园，则除了万寿山清漪园（颐和园）、玉泉山静明园、香山静宜园之外，还包括圆明园和畅春园。但就广义而言，“三山五园”所涵括的园林建筑其实并不局限于此，它也是可用以概指整个北京西郊一带的清代皇家园林的一种泛称。三山五园的兴建、繁盛与衰落，见证了明清以来社会之变迁，王朝之盛衰，也汇聚了清代思想、文化艺术之精华，它们不仅是清代皇家园林研究的重心所在，无疑也是清代历史研究中极为重要的内容。

清代皇家园林的研究涉及历史、园林和建筑艺术等许多领域，具有非常突出的跨学科特点，其研究空间的开辟、研究课题的开展乃至研究内容的深化，均需要拥有各种资源优势和不同研究重心的各家单位团结协作，否则难以奏功。长期以来，寻求并重视学术合作，尤其是与颐和园、圆明园、避暑山庄、恭王府等清代园林管理机构的协同创新，乃是中国人民大学清代皇家园林研究的宝贵传统，事实证明这也是该学术领域能够不断有所开拓，积累渐次增厚的重要前提和保障。

中国人民大学在清代皇家园林方面的研究始于复校之初。早在1978年，清史研究所即与颐和园管理处合作编写出版了《颐和园》一书，成为三山五园研究领域内带有开拓意义的学术著述，被列为《北京史地丛书》之一，王道成等先生即参与了写作。20世纪80年代，清史所逐步发展成为海内外的清史研究重镇，关于皇家园林的研究也

取得更为丰富的成果。1982—1983年，受教育部委托，人大清史所曾举办过为期一年的全国高等院校中国近代史教师进修班。在进修学生临近毕业之际，根据人大老校长李文海先生的提议，清史所特将这批年轻的史学工作者组织起来，带领他们对近代北京史迹进行实地的考察、调研，得到了北京各家文保单位的支持，最终形成王道成、林克光、孔祥吉主编的《近代京华史迹》一书，1985年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后，产生了较大影响。后又修订扩版，除了包括颐和园、圆明园等三山五园方面的史迹介绍外，还涉及恭王府、庆王府等北京其他皇家园林的内容。1986年，王道成先生又出版《圆明园》一书，代表了这方面研究的最新进展。他后来还积极参与有关圆明园重建问题的各种讨论，并编辑出版了厚重的《圆明园重建大争辩》一书，在海内外产生了重要影响。多年来，王道成先生发表了大量关于清代皇家园林研究方面的各类成果，成为国内从历史角度研究清代皇家园林的重要代表人物。1988年，戴逸先生撰成《乾隆帝和北京的城市建设》一文，高屋建瓴，较早从北京城市建设的角度探讨并肯定清代皇家园林的历史价值。其后的1992年，戴先生又出版《乾隆帝及其时代》一书，其中的第八章题为《北京城市建设》，自觉地将三山五园作为历史专题，细致梳理了其所兴建的历史脉络，进而总结分析了其对清代京城乃至当代北京城市格局的历史影响。这是当时史学界研究清代皇家园林的标志性成果之一。

除了三山五园之外，人大清史所对承德避暑山庄的研究也作出了突出贡献。戴逸、王思治、罗明、张羽新等先生，可谓代表。尤其是王思治先生，成绩最为显著。1980年，清史所与承德文物局合作编写了《承德避暑山庄》一书，由文物出版社出版，其中王思治、罗明等代表清史所做了重要工作。2000年，王思治先生又在台湾（万卷楼图

书公司)出版《避暑山庄与外八庙》一书。2003年,在避暑山庄建园300周年之际,王思治先生在中央电视台的“百家讲坛”专门讲授《避暑山庄百年史》,产生了较大的社会反响。同年,为纪念避暑山庄建园300周年的国际学术讨论会召开,戴逸先生主编了该会论文集,题为《清史研究与避暑山庄》,2005年由辽宁民族出版社出版,有力地推动了避暑山庄学及其与之相关的清代历史研究。

可以说,持之以恒、孜孜不倦、别具匠心的个人钻研、集体努力以及同其他单位合作所陆续取得的研究积累,确立了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在清代皇家园林领域的重要学术地位。

为继承和发扬清史研究所在清代皇家园林研究领域的学术优势以及同园林管理部门紧密合作的传统,进一步推动和开展清代皇家园林领域的研究,2008年,清史所与圆明园管理处合作,共同创建了“清代皇家园林研究中心”。后来,北京市海淀区文化发展促进中心也正式加入进来,形成三家精诚合作的学术家园,旨在共同搭建学术研究与社会服务资源共享的文化发展平台,希望对促进北京的城市发展和建设、丰富市民社会文化生活有所助益。应该看到,当代史学研究实际上也越来越需要与社会文化实践的结合,研究者关注社会、服务社会文化建设的迫切性可谓有增无减。在这方面,如何转换思路,拓宽视野,某种程度上也对清史研究所提出了新的要求,而“清代皇家园林研究中心”自然应当成为探索历史研究与现实文化建设自觉结合的窗口之一。

三山五园研究,跨越历史与现实,成为清史研究与当代社会现实紧密联系的重要桥梁,也是“清代皇家园林研究中心”和园林管理等部门实现合作的学术资源。各家相互依存、相互支持,是学术研究与社会服务实现良性互动的重要保证。一方面,三山五园研究的丰富学

术成果的积淀，可以为社会服务和文化利用创造条件，发挥强大厚重的学术支撑作用；另一方面，三山五园的园林实践、文化产品的开发以及具体的实地、实物考察，也可为整个清史研究注入新鲜的动力和活力，这一催化剂与清代政治、经济、军事、社会、边疆民族、思想文化诸方面的研究交汇融合，还会碰撞出智慧的火花，催生出新的学术课题，有助于进一步拓展研究空间，丰富和深化现有研究思路。

秉承上述理念，“清代皇家园林研究中心”自创建以来，对清代皇家园林尤其是三山五园的专题研究进行了认真论证和规划，并诉诸实践。我们自觉把基础研究和社会服务两相结合：一方面，注重史料积累和学术研究的双线推进，拓展研究的广度与深度；另一方面，设计课题时尽可能考虑到社会需求，强化研究成果的社会化转换。在这方面，我们的研究，离不开海淀区宣传部、尤其是其直接领导的文化促进中心和圆明园管理处的积极推动、热情支持和大力帮助。特别是陈名杰部长和叶亮清主任，可以说发挥了关键作用。还在陈、叶分别担任圆明园管理处正、副主任的时候，我们就进行了多方面的合作，此后的曹宇明主任等圆明园管理处领导又继续推动了这一合作。我们非常珍惜与圆明园的长期合作关系，也希望能够进一步得到海淀区宣传部及其领导下的文促中心的持续性支持。

2011年，清史所王道成先生作为主编之一，参与了圆明园管理处与中西书局合作编译出版的“圆明园劫难记忆译丛”（第一辑）的工作，译丛涵括英法联军侵华关键人物的亲历回忆录14种，可谓从英法联军视角描述第二次鸦片战争的资料库，也是圆明园劫难历史资料的首次大规模、成系列地在我国翻译出版，它揭露了当年英法联军入侵中国的大量历史细节和第一手原始资料。

近年来，“清代皇家园林研究中心”与北京市海淀区文化发展促进

中心精诚合作，共同设计了以三山五园研究为中心的史事编年、专题研究和史料汇编三者相结合的研究规划。2014年，中心何瑜教授主编的《清代三山五园史事编年（顺治—乾隆）》一书由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出版，利用起居注、实录、清帝御制诗文集等历史文献以及清代档案，首次较为全面地梳理了清代嘉庆朝之前三山五园的历史发展脉络，是规划研究成果的初步呈现。乾隆朝之后的部分也正在顺利进行当中。

三山五园的历史文化课题兼具历史研究、园林与建筑艺术、文化传承和当代城市建设等多方面的价值，学术资源丰富，研究空间广阔，在今后若干年内，可能仍将成为我们中心展开学术探索的核心目标。今年，我们中心得到北京市海淀区宣传部的大力支持，同以叶亮清为主任的海淀区文化发展促进中心继续深入合作，再次推出最新成果，即由阚红柳主编的《海外三山五园研究译丛》和《畅春园研究》论丛。前者是海外有关学术研究成果的编译整理，后者是关于清代畅春园的学术研究的最新论集。《译丛》共遴选海外英文发表的关于三山五园研究的学术论文12篇，合计字数约40万字，所选论文涵盖国家、地区广泛，涉及领域众多，视角新颖，是近年来明清皇家园林研究领域内较为全面反映海外学术前沿的标志性成果。论丛则以入关后的清代第一个皇家园林畅春园为专门研究对象，组织学者撰写专题论文12篇，合计字数约25万字，分别从该园的历史变迁，最初建园理念、居园理政、园林格局、民族文化特色、艺术及思想内涵等诸多方面，首次对其进行系统深入的探究，具有填补学术空白的意义。我们相信，《译丛》和论丛的出版，将有助于推进学界的相关研究，对海淀区三山五园文化园区的当代建设亦将不无助益。

阚红柳同志是清史研究所的副所长，也是清代皇家园林研究中心

的常务副主任。作为新一代清代文化史研究的佼佼者，她近年来以高度的热情加入到清代皇家园林研究队伍中来，为我们的事业带来了新的活力和希望。我衷心地感谢她的付出和责任感，也相信在她的带领下，这一领域的研究，能够不断取得新的更大的成绩。是为序。

黄兴涛

2015年5月

前言

坐落在北京市海淀区的“三山五园”是清代皇家园林文化的重要代表，其园林盛景和文化影响如熠熠明珠，震古烁今。作为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三山五园”的研究久为国际学界所瞩目。自17、18世纪来华传教士、使臣、商人、士兵等的记述流传海外，“三山五园”的园林艺术元素以及相应的学术研究价值即引起海外学者的普遍关注，其热情持续数百年，绵延至今，形成了一大批内容丰富、颇具特点的海外研究成果。

—

追溯海外的清代皇家园林研究，始于17、18世纪来华的传教士和使臣，他们以见闻和记述的形式将中国的造园艺术引入西方，清代皇家园林的文化影响遂拓展至世界各国。

17世纪中期，意大利传教士卫匡国在其著述中描述了北京皇宫里的花园。尽管其记述源自传闻，真实性不强，但记有花园里有小河，随山蜿蜒曲折，涉及皇家园林建造过程中的叠山和理水两要素。紧随其后，荷属东印度公司派往北京使节的随员纽浩夫（又译作尼霍夫）在其记事报告中根据卫匡国的描述再次谈及北京皇宫里的河流、树林和假山。这些简要记述涉及清代皇家园林的基本元素，奠定了西方人认知的最初印象。

自顺治、康熙至雍正、乾隆朝，服务于清朝皇帝并得以出入宫廷的传教士数量增多，他们对清代皇家园林的观察和记述也日趋翔实。法国传教士张诚、白晋和葡萄牙传教士徐日昇都参观过畅春园。他们

在调查记录和著述中较为详细地描绘了畅春园的美丽、朴素和雅洁，在园林基本元素的基础上他们进一步阐释皇家园林的艺术风格和品位，带有一定的理性色彩。意大利传教士马国贤，在清廷当了13年（1711—1723）画师，他曾游览畅春园，也到过避暑山庄，参与绘制避暑山庄三十六景图。在回忆录中，马国贤描绘了畅春园的美景，并注意到，清代皇家园林畅春园与欧洲园林的区别在于以艺术的手法模仿自然，这种辩证认识以及有意识地进行中西园林艺术内涵的比较已初步具有研究性特征。

众所周知，18世纪最深入介绍中国造园艺术的是法国传教士王致诚。王致诚在如意馆任画师，参与绘制圆明园四十景图。1743年，他给在巴黎的友人达索写了一封长信，详细描述了圆明园的景致。出于对皇家园林造园艺术的热爱，王致诚在信函中总结，中国造园艺术的原则是追求自然，而圆明园富于变化的结构特点则由此而来。王致诚的记述轰动了整个欧洲，引起了欧洲各国王公贵族对清代皇家园林的广泛兴趣。几乎与之同时，另外一位传教士蒋友仁在给巴比翁的信中谈到了清代皇家园林的特点。蒋友仁是长春园大水法的设计者，参与施工建造，他在信中写道，“在装饰他们的园林方面，中国人十分成功地用艺术去使自然完善”，他还谈及中国园林景观的不规则性以及由此产生的美感。此后，曾长期在圆明园内作画的韩国英神父撰写了《论中国园林》一文，其文章又有新见，不仅反映了皇家园林的结构要素，而且发掘其思想性内涵，在他看来，“人们到园林里来是为了避开世间的烦扰，自由地呼吸，在沉寂独处中享受心灵和思想的宁静，人们力求把花园做得淳朴而有乡野气息，使它能引起人的幻想”。由此，韩国英神父进一步总结了中国园林选址的具体要求。

除传教士之外，以见闻形式记述清代皇家园林的还有来华使臣，如18世纪晚期来华的英国使臣马戛尔尼及其随员巴罗，另有使团副使斯当东所撰《英使谒见乾隆记实》。1860年，英法联军劫掠焚毁圆明

园，亲历者亦有一些见闻类著述问世，论其学术研究性，较比传教士未见更多突破，故不一一赘述。1864年，法国汉学家鲍吉耶的文章《探访圆明园》在法国《环球》杂志上发表。鲍吉耶从未到过中国，他在文章中汇总了中法文献当中关于圆明园的描述，被认为具有准确性、渊博性和学术性，为以记述皇家园林见闻为主的时代划上了圆满的句号。应该看到，自17世纪以来，直至19世纪对三山五园的记述尚不足以称为完整意义上的学术研究。但值得关注的是，清代皇家园林进入海外学者的视野几乎与其兴建同步。并且，记述性的成果涉及到园林的建筑原则、艺术风格等内容，堪称研究的萌芽状态，开启了海外学界的研究之路。

更令人惊讶的是，海外完全意义上的三山五园研究几乎与国内的研究同时产生，是海外汉学发展的先驱。早在20世纪30年代，国内学界以中国营造学社为主开启对清代皇家园林现代意义的学术研究之时，海外亦有相关研究成果问世。1934年，原清华大学的美籍教师卡罗尔·马伦出版了《清朝之北京夏宫史》，稍晚，北京圣文生传教会传教士亚乐园撰写了《圆明园：18世纪耶稣会士的建筑作品》，这两部著述是20世纪30年代海外研究中直接与三山五园相关的代表性成果。40年代，海外学界的成果主要有兰开斯特的论文《圆明园的欧式宫殿》以及喜仁龙的专著《中国园林》；50年代的代表性成果则是胡普·丹比所著《圆明园及居住其间的皇帝的历史》。

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海外的三山五园研究未见更突出的成果问世，但此一时期来华的学者则为下一个阶段的海外研究储备了力量。法国汉学家毕梅雪曾于20世纪60年代初留学于北京大学，她所在的法国国立科学研究中心在1983年成立了圆明园西洋楼专门研究组，由毕梅雪主持，重点研究西洋楼和御花园的建筑年代、建筑技术和用途，80年代晚期这一研究小组发表了一些重量级的文章。澳大利亚汉学家白杰明则是自20世纪70年代起在中国生活多年的学者，他关于圆明

园的专文成稿于 90 年代中期。1979 年，舒衡哲作为首批美国留学生在北京大学中文系进修，北大的学习经历和海淀的生活体验促成了她对鸣鹤园的研究，其成果在 2009 年正式出版。

进入 21 世纪，最具代表性的三山五园研究专著分别为：巴黎大学远东研究中心研究员邱治平于 2000 年出版的法文版《圆明园》一书；汪荣祖于 2001 年出版的英文版《追寻失落的圆明园》一书，新加坡国立大学萧驰同年出版的英文版《中国园林与抒情传统》一书。三部专著的问世不仅将清代皇家园林的研究推向新的高潮，而且昭示出华裔学者在海外研究领域日益重要。历经长时期的学术积累，三山五园研究已发展成为海外汉学重镇，研究成果丰富，涉及历史学、建筑学、文艺学、美学等多领域。

二

国内学界对海外的研究成果向来重视，早在 20 世纪 30 年代，唐在复翻译了《乾隆西洋画师王致诚述圆明园状况》。1933 年，毕业于清华大学西方语言文学系的欧阳采薇翻译了《西书中关于焚毁圆明园纪事八篇》，刊于《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第三、四号合刊“圆明园专号”上，内容依据当时英国远征军司令格兰特的私人日记以及额尔金私人秘书、随军牧师、领事、英军军医等人的著述，这是最早翻译成中文的披露关于焚毁圆明园的材料。另外，比较重要的翻译成果还包括张恩荫、杨来运主编的《西方人眼中的圆明园》（2000 年），钟志恒翻译的《追寻失落的圆明园》（2005 年）。在史料翻译方面，比较突出的贡献是王道成与布立赛合编，圆明园管理处与中西书局合作编译出版的“圆明园劫难记忆译丛”（2011 年和 2013 年）。海外研究成果的编译一直是国内学界关注的重点之一。

为传承学界研究传统，系统清理并向国内学界推介海外相关研究成果，以有助于学习、借鉴及研究其学术观点，拓展三山五园的学术研究，中国人民大学清代皇家园林研究中心与北京市海淀区文化发展

促进中心合作开展了《海外三山五园研究译丛》学术编译工作。《译丛》共遴选海外英文发表关于三山五园研究的学术论文 12 篇。

在论文的编选方面编者追根溯源，对数百年来的海外研究成果做了系统梳理，在数以百计的研究论文中精心遴选了 12 篇具有代表性的文章加以翻译。《译丛》所选论文涵盖地域广泛，作者分别来自美国、法国、瑞典、澳大利亚、中国香港、中国大陆等不同国家、地区，反映出三山五园研究在国际学界的辐射状分布。这些作者，有些在汉学领域内多年耕耘，享誉学界，如毕梅雪、舒衡哲、白杰明；有些则属于代表海外汉学领域新生代学者的中青年群体，如柯启玄、墨克劣、李启乐、许冠儿；有些则是旅居海外的华裔学者，如李海燕、胡广俊；《译丛》还有意选择了香港地区以及留学海外的学者英文发表的成果，如童庆生、唐克扬的论文，以反映国际学界中国学者的声音。

为确保所选论文的学术价值和前沿地位，《译丛》所选文章绝大多数为初次汉文翻译发表，编者还颇为注重所选论文的出处和发表的时间。从论文遴选的出处来说，既有海外汉学的重要研究阵地，如《晚期中华帝国》、《哈佛亚洲研究》、《东亚史》等，也包括一些电媒网刊，如《园林史和景观设计研究》等。《译丛》遴选论文均在近年发表，绝大多数文章是 2012—2013 年的学术成果，从而与国际学术前沿密切相连。

《译丛》反映的学术研究领域涵括历史学、文献学、文艺学、美学、建筑学等多领域，系统勾勒出三山五园国际研究的学术空间脉络。就论文的内容和观点来说，《译丛》所选文章在学术研究视角和学术观点方面均有一定的独到之处。在历史学研究方面，柯启玄的《心照不宣的共谋：乾隆朝圆明园太监的充权》一文借助原始档案细致地考察乾隆一朝对太监的管理，对前辈学者郑天挺等认为太监权利泛滥始于 19 世纪的观点提出质疑，认为在乾隆朝对圆明园太监的管理方面即存在着彼此互相妥协、互相制约的一面。柯启玄的研究表明，三山五园

的研究为拓展和细化清代史学研究提供了个案。墨克劳的《重振王朝：同治时期的政治、交流和圆明园（1873—1874）》一文将重建圆明园这一历史问题置于同治朝的复杂历史背景之下，试图还原共同利益刺激下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关系。林瑞谷的《对神奇世界的阴谋：梦想东方与毁坏圆明园》一文认为，对毁坏圆明园的历史因素的考量除了应注意政治和军事背景之外，中国宫殿在欧洲文化史以及人们心中的地位变化也是酿成毁灭的重要因素之一，甚至可视为惨剧发生的前提背景。上述史学研究成果均在皇家园林史学研究领域有所创见和突破。

对皇家园林的景观建筑、美学价值、文化内涵予以特殊关注是海外三山五园研究的传统。毕梅雪的《中国朝廷的“欧洲热”——谐奇趣（1747—1751）的宫殿、建筑与室内装饰》一文注重探讨圆明园内的欧式建筑；李启乐的《上演欧洲：中国宫廷的戏剧风格与绘画》一文从建筑和绘画结合的角度探讨清代君主塑造园林景观的内心世界；童庆生的《帝国废墟美学：额尔金氏与约翰·包令》以及舒衡哲的《满族亲王奕譞（1840—1891）：生活与诗歌中的记忆》一文从文艺学、美学等角度关注清代皇家园林的艺术风格和文化内涵。

三山五园是历史的产物，也是现实生活的一部分，其研究不仅关涉历史和学术，而且与现实密切相关。许冠儿的《如何绘制出遗址：圆明园档案和中国建筑史》追溯了圆明园海外研究的文献发掘史和学术研究史；李海燕的《圆明园遗址：民族之殇》、白杰明的《圆明园小史》，以及胡广俊《米万钟（1570—1628）的勺园：通过视觉与文字资源再现一处晚明景观》、唐克扬《从废园到燕园——对于亨利·墨菲的燕京大学校园计划方案的探讨》都不同程度地反映出海外学界对皇家园林当代社会和文化功能的共同关注。这些成果角度新颖，观点明确，代表了海外学界研究皇家园林的传统范式和当代格局。

必须承认，三山五园之中，圆明园的研究最为海外学界所瞩目，其研究成果蔚为大观，相对而言，其他园林的研究则没那么丰富，甚

至乏善可陈，这是《译丛》在遴选论文之时遇到的最具挑战性的问题。为此，编者在对圆明园研究论文精挑细选的同时，有意识地选入反映三山五园其他园林研究的成果，以保证《译丛》主题的完整性。但毕竟只能因地取材，故《译丛》折射出的三山五园研究状况的不平衡性恰为海外学界自然状况之反映。

我们期待，《译丛》的编译、整理和出版有助于推进学界的相关研究，对海淀区“三山五园”文化园区的当代建设亦有所助益。

三

《译丛》的编译出版是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清代皇家园林研究中心与北京市海淀区文化发展促进中心合作努力的学术成果。《译丛》从选题、论证、翻译、校审，到出版仅有一年多的时间，期间得到了北京市海淀区区委常委、宣传部长陈名杰，副部长牛爱忠以及海淀区文化发展促进中心的大力支持。在《译丛》的翻译和校审以及出版过程中，海淀区文促中心的叶亮清主任、张东旭副主任、于佩丽、王晶丽等同志均给予了大力帮助，积极参与各项事宜，确保了《译丛》的顺利完成和出版，在此谨致以诚挚的谢意和敬意。

2014年年底，为保证项目的顺利进行，双方合作组织专家进行了开题论证，其间原北京市海淀区政协主席张宝章先生，中国人民大学清史所退休教授王道成先生，北京联合大学文理学院院长赵连稳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院长、清代皇家园林研究中心主任黄兴涛教授，中国人民大学清史所所长夏明方教授，以及何瑜教授、华林甫教授均对论文的遴选提出了参考建议，以保证论文的质量水平和代表性，在此一并致谢。

《译丛》论文遴选和最终确定由阚红柳和董建中负责，董老师还在原有选目基础上补充了数篇论文。论文的翻译工作主要由清代皇家园林研究中心的成员和中国人民大学清史所的青年学子一起完成。清代皇家园林研究中心参与翻译工作的学者包括：董建中、颜军、廖菊棟；

清史所参与翻译工作的学生包括：博士生蒲海涛、郑云艳、周勇军，硕士生曲世侠、刘淑娟、张家宸、陈晨。此外，任职于文化部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的王江先生、中国人民大学清史所的胡祥雨老师也参加了论文的翻译工作，在此表示感谢。参与论文校审工作的包括阚红柳、董建中、颜军、廖菊棟，陈晨同学在核对译文原文环节中提供了积极帮助，在此表示感谢。

为确保翻译质量，我们还尽可能与论文作者取得联系，如王江与柯启玄多次信函联系，商量具体翻译事宜，柯启玄还亲自审定了译稿；董建中与李启乐也长期保持联系沟通；唐克扬本人亲自审定译稿。这些均为保证翻译质量，避免错讹奠定了基础，我们在此对这些作者认真负责的学术合作精神表示诚挚的谢意。

《译丛》出版过程中得到了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编辑同志的大力支持，在此一并致谢。

海外的三山五园研究是国际学术研究空间中非常独特和珍贵的研究资源和研究力量，我们诚挚地希望《译丛》的推出能为推进学界研究，增强海内外学术交流，提升三山五园的研究水平贡献力量。在翻译和校审过程中，我们尽量字斟句酌，仔细核对，印证原文。因《译丛》为海外论文之合集，原作者在参考文献使用、引文标识方面均各有特点，我们在翻译过程中为保持《译丛》的整体性尽可能有所调整，力争统一，但囿于闻见，又译成于众手，难免有参差不齐之处。又因学识所限，难免疏漏，敬请方家指正。

阚红柳

2015年6月